

如何紀念「過渡人物」： 敬覆朱學勤先生

● 錢永祥

在《二十一世紀》今年6月號(總第七十七期)上，朱學勤先生發表了〈「常識」與「傲慢」——評曹長青、仲維光對李慎之、顧準的批評〉一文。文章結束前，有如下一段文字：

(殷海光先生去世)三十多年後，殷氏弟子的自由主義傳人卻還是難以擺脫海外時風之通弊。他們大多有留洋之資歷，確可彌補當年殷氏知識追求之遺憾，卻逐漸淡化乃師之實踐擔當，以「知識傲慢」挑剔本土民主進程之曲折，或自我隔離陷於失語，或嫁接於「新左」，掉頭他去。如此之蛻變，則反而坐實當年宵小對乃師之譏評，可痛可惜。時風所及，彼岸之失誤，此岸有重燃之勢……。

筆者目前在「彼岸」擔任殷海光基金會董事長一職，雖然本身不能算是殷氏弟子(或者弟子的傳人)，但是基金會開宗明義，宗旨即在「紀念殷海光先生闡揚自由主義與民主制度的貢獻」，的確有責任傳遞殷先生的自由主義薪火於今日、於海內外。故即使朱先生的指責突兀而苛刻，仍不能不令我有所反省、檢討。

不過，朱先生的文章有其更一般性的意義，那就是帶出了一個基本的課題：殷海光、李慎之以及其他類似的「過渡時代的人物」(這似乎是仲維光先生的用詞)，後來者應該如何評價、如何繼承？誠如朱先生所言，挑剔這類人物身上的諸多限制，不僅忽視了歷史環境對個人視野、成就的先天羈絆作用，而且顯得輕浮傲慢。關於殷海光先生在學問方面的限制、以及在道德方面的成就，林毓生先生的評論鞭辟入裏，朱先生文中已經摘引，於此不須贅詞。關於殷海光先生的自由主義應該如何繼承，我個人則另有一些想法，分別涉及對殷先生斯人的領會、以及對自由主義之歷史性格的理解，願意在此用有限篇幅勉力陳述，或許可以解除朱先生的部分指責。

表面上看，在台灣過去三十多年間的演變中，殷海光已經變成了一個不甚相干的歷史人物。今天，台灣很少有人讀他的著作；年輕一代裏的大多數，不曾聽過他的名字。十年、二十年以後，顧準、李慎之在中國大陸的遭遇會是甚麼光景，我不敢逆料。不過，我身在殷海光基金會，出於工作需要，不能不自問：「對今天的台

朱學勤的文章帶出了一個基本的課題：殷海光、李慎之以及其他類似的「過渡時代的人物」，後來者應該如何評價、如何繼承？誠如朱先生所言，挑剔這類人物身上的諸多限制，不僅忽視了歷史環境對個人視野、成就的先天羈絆作用，而且顯得輕浮傲慢。

灣社會，殷海光究竟還有甚麼意義？」針對顧、李先生的遺產，朱先生也終將不免追問同樣的問題。我必須強調，回答這個問題，絕對不是已去者的責任，而是後來者的承諾。既然你企圖維繫一份歷史典範、有心建立一個傳統，你就有職責說清楚，這個典範含有甚麼猶未磨滅的內容、這股傳統具有甚麼洞視問題的活力，是令人必須尊重、正視的？如果這些說不清楚，那麼面對時代的淡忘冷落，又有甚麼可以抱怨的呢？

那麼，殷海光在今天真的不相干了嗎？為着回答這個問題，我想強調一個難免引起爭議的看法：在中文世界裏，所謂自由主義，內容上大概僅有「反對不民主」這項訴求稍具形貌，此外乏善可陳；當年是如此，到今天恐怕改善並不多。中國大陸的情況不談。台灣在擺脫了黨國威權體制之後，既有的有關自由社會與民主體制的論述，一夕之間萎靡不振，充份說明了中文自由主義本身的貧乏。試問，在其他早有民主制度的國家，自由主義不是依舊在發揮批評與開放、進步的作用嗎？台灣十幾年來的民主化，雖然有值得珍惜的進步，但在好幾個關鍵的方面，從憲政體制、法律主治、社會公平，到集體性的價值與個人價值的衝突，到政府與媒體的關係，到文化的自主發展、族群的社會合作等等，新興政治勢力都已經另有盤算。面對這種局面，僅以「反對不民主」自恃的自由主義，當然秋扇見捐：當統治者業已掌握住了——甚至可以隨需要的尺寸操作生產——「民選」意義下的民主正當性，視野如此短淺的自由主義，又能代表社會提出甚麼相對的批評與訴求呢？

殷海光不曾在這個層次意識到中文自由主義的限制。不過，穿越他一

生取捨借用過的各種思想立場、學術觀點，探索他自己都不一定有機會洞察的內裏，你會感受到，在反威權之外，他畢竟還擁有更深、更廣的一層關懷，假以發展的機會，是足以揭示一片真正屬於自由主義的視野的。殷先生的人格力量所在，乃是敢於揭發「個人尊嚴」這項終極價值，對抗各種壓迫、侮辱，各種庸俗、無聊的勢力與趨勢。為了維繫個人尊嚴、為了給人的尊嚴找到妥當的概念表述與制度支撐，他一直在認真、努力地思考、寫作和生活。由於資源和經驗的匱乏，他的努力並沒有得到預期的成果。不過說來吊詭，他追求尊嚴而未成功的過程，本身正是尊嚴的高度實現。無論如何，殷先生的例子說明，若是不忘自由主義的根源關懷原本就在維護個人尊嚴，能將尊嚴聯繫到社會、文化、政治各個層面上個人所遭受的系統性的壓迫與扭曲，進一步追問該如何批判與消除這些壓迫，自由主義的潛在豐富內容，才可望顯露頭緒。我認為，一旦從這種關懷、這種問題意識出發，摸索自由主義在今天的意義，殷先生的典範會恢復活力，中文自由主義的思考傳統，也會走出幼稚階段，開始成長。

在這種問題意識的映照之下，前引朱先生所指責的一些現象，或許竟應該看作有意義的正面發展。例如所謂「挑剔本土民主進程之曲折」：其實對台灣政黨輪替以後的政治走向加以批判，不僅是自由主義本來即應擔負的責任，也有助於自由主義的政治思考（而不僅是反威權的政治思考）在中文世界找到自己的問題和位置。又例如所謂「嫁接於新左」：雖然我不明白朱先生的確實意思，不過，掌握自由主義在歷史上曾經如何吸納各種受壓迫者——宗教壓迫、身份壓迫、階級

在中文世界裏，所謂自由主義，內容上大概僅有「反對不民主」這項訴求稍具形貌，此外乏善可陳；當年如此，到今天恐怕改善並不多。殷海光先生敢於揭發「個人尊嚴」，將尊嚴聯繫到社會、文化、政治各個層面上個人所遭受的系統性的壓迫與扭曲，進一步追問該如何批判與消除這些壓迫。我認為，一旦從這種問題意識出發，摸索自由主義在今天的意義，殷先生的典範就會恢復活力。

政治思考者要面對的應該是問題，而不是宗派。自由主義有沒有生機，對今天的社會是否還相干，有沒有能力為社會開拓前景、為受壓迫受侮辱的人們提供希望，其實要看它有沒有能力善用廣泛的資源，介入社會各方面爭議，提供有原則的(而非僅是策略性的)建議。

壓迫、性別壓迫、種族壓迫、極權官僚壓迫等等——求解放、求平等的訴求，其中包括了廣泛的進步運動針對資本主義提出的檢討與糾正，當然是重建自由主義論述時，至為要緊的理知與實踐工作。

這種對自由主義的期待，意思不啻是說：政治思考者要面對的應該是問題，而不是宗派。他應該敏感地察覺問題的存在，以問題為導向，從普遍性的價值意識出發，學着對於社會的重大、根本動向有所掌握、澄清、陳述。這時候他所關心的，當然不是思想資源的門派來歷，而是這些資源對於指認和處理問題，能發揮多大的

效用。我認為，自由主義有沒有生機，對今天的社會是否還相干，有沒有能力為社會開拓前景、為受壓迫受侮辱的人們提供希望，其實要看它有沒有能力善用廣泛的資源，介入社會各方面的爭議，面對這個時代裏擾人的各種議題，提供有原則的(而非僅是策略性的)建議。這是我對自己的期許。我猜想，這也比較接近殷先生當初的志業所在。

錢永祥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

對朗宓榭的回應

● 劉述先

讀到《二十一世紀》今年4月號(總第七十六期)朗宓榭[Michael Lackner]的文章〈源自東方的科學?——中國式「自斷」的表現形式〉(楊煦生譯),覺得很有意思。他有一些睿識,也指出了一個值得作進一步探究的方向,但因概念層次缺少一些必要的分疏,不免有了瑕疵,特別是他提到了我的名字,對於新儒家和我的思想有所誤解,故在此作一簡短的回應。

首先我也認為文化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。由於古代文明分別在相對獨立的情況下發展,各自展現了不同的特色,而有了西方、印度、中國等等

的差別。今日無疑是西方科技商業文明席捲世界佔有主導地位的情勢。一個文化接觸異文化,很自然地首先會經歷「格義」的階段,然後才会有比較相應的理解,最後才會到達有效地吸收、消融、交集的地步。特別是面對強勢異文化的衝擊,不免會啟動某種自我防衛的機制,這也是人情之常,不足為異。

就中國吸收外來文化的經驗來看,首先是受到源自印度的佛教文化的挑戰。但佛家是出世法,並未動搖傳統中國文化的根本,世間的禮儀仍然是儒家那一套。《老子化胡經》則只能